

求是集



第二集

责任编辑：谭天河
张健行

求是集(第二集)

陈乐素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印张 1插图 265,000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710册

书号11111·127 定价2.30元

序

徐 规

两宋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发达昌盛，史学研究的成就超越前代，史学著作大批出现，特别是多卷本通史、当代史和方志书的编修，取得显著业绩。同时产生了新的历史编纂体裁——纪事本末体，还开辟了金石学这个新园地，把历史研究的范围，从文献资料扩大到金石器物。

元代学者本可在上述基础上撰成一部质量优秀的宋代史，而结果是元末官修之《宋史》，不仅内容繁芜杂乱，史实错谬缺漏，且论述编次，亦多失当，为明清学者所不满，曾先后数次重修，因限于条件，未能收效。

清季以来，宋人所撰本朝史籍，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至清人所辑的《宋会要稿》诸巨著相继刊刻、影印，广泛流行，给近人研究宋代史提供较好的条件。同时，在西方新史学影响下，我国学者转而从事宋史专题研究，写出不少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本师陈乐素教授就是一位较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并获得丰硕的成果。

乐素先生幼聆庭训，学有渊源。少年时，又东渡日本读书。回国后，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叶，在上海《日本研究》杂志刊布《魏志倭人传研究》、《后汉刘宋间之倭史》两文，阐幽显微，论断精审，引起日本学者的注目与推重。“九·一八”事变以后，即专心钻研宋代史事，短短四年间，相继发表论著四篇，其中《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两文，约十五万言，网罗弘富，考订详实，为先生早期的代表作，迄今国内外研治或评介徐梦莘其人及其书者，莫不资藉于此。

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次年秋，先生携眷自香港脱险进入内地。时浙江大学国史教授张荫麟师因病逝世，先生承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推荐，应浙大校长竺可桢师之聘，至贵州遵义，担任文学院史地系教授，主讲《唐宋史》、《日本史》和《中国目录学史》等多种课程，旋兼史地研究所导师。自是直至一九四九年，青年学子从治宋史者颇多，经由先生悉心指导，严格要求，后来不少人在学术上皆有所建树。其时正值战争岁月，生活艰苦，图书缺乏，先生仍夜以继昼，力事著述，陆续刊出论文十余篇，涉及宋代重要史籍与其作者、宋代社会与阶级关系、宋代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地方史、中日关系史等方面问题，多独辟门径，贡献甚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留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视野更加广阔，然而由于先后担负学校行政和出

版社编审工作，黽勉从公，个人学术研究不无影响。十年浩劫中，又屡遭折磨，研究工作几陷停顿。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政策、措施深得人心。先生虽年事已高，但志在千里，又重返杭州大学（其前身为浙江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历史系筹建宋史研究室。翌年冬，南下广州，为暨南大学历史系创办宋史研究室，继续替国家培养研究人才，并潜心述作，发表多篇论文，为史学界所称颂。

今岁，暨南大学宋史研究室应各方请求，汇编先生历年论著为《求是集》，付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既有利于国内外学者的参考，亦将推动我国宋史研究事业的发展。

规忝列门墙，逾四十载，受教良多。今承命为《求是集》作序，自惭浅陋，未能表彰先生学术之精髓。所幸常绍温同志撰写《陈乐素同志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情况述略》一文，对先生道德文章已有翔实的纪述，谅读者可从中得到启迪。

1984年5月于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

陈乐素同志从事教育和 学术研究情况述略

(代序)

常 绍 温

陈乐素同志是目前我国老一辈宋史研究学者之一，现年八十一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已整六十年。今年四月，暨南大学曾为此开会庆祝。他的经历，体现了一个旧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内忧外患深重的年代中，通过工作和生活实践摸索救国之道，受到时代的教育，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以及为发展祖国教育文化事业，在漫长岁月中如何艰辛奋斗的过程。近年以来，有不少同志探询他的著述情况和治学经历。因此暨南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特将他历年所撰论著之尚能收集到者，编为论文集付印，名之为《求是集》。并由我对他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情况略加介绍，以为代答。限于个人水平，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陈乐素同志，广东新会人，生于一九〇二年。幼小时，祖父对他期望甚殷，取名博。他成年后钻研学问，深慕历史上一些高风亮节之士往往安贫乐素，刻苦自励，以道德学术名世，于是更名乐素。他日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就长期使用这个名字。

乐素同志的祖先经营药材生意。他的父亲陈垣同志是当代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以擅长考据学、元史、宗教史等见称于国内外，先后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达四十六年之久。乐素同志就是在他父亲的熏陶教育之下成长起来的。

乐素同志从小就爱读文学、历史方面的书，听讲历史故事。六、七岁时就喜欢看《三国演义》。陈垣同志针对他的爱好，教他把这部书中每一回初出现的人名地名记录下来。那时他虽然还不能完全认识书中的字，便已开始摘录书中英雄人物的事迹和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引起了学习历史的极大兴趣。这可以说是他以后致力于历史研究工作的萌芽。

一九一八年乐素同志十六岁，东渡日本，在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在日本留学的四年中，除上课外，他的业余时间主要从事两方面的学习：一有机会就去听著名学者的学术报告，经常去图书馆，为陈垣同志收集有关宗教史的资料，同时抄录、翻译日本学者有关中国历史及经济、时事方面的论文。一九二一年，他所译的关于日本金本位制度的文章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加强了他研究日本的信心。这一阶段的学习和工作实践，使他对日本学术界重视中国文化和仔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情况，产生了深刻印象。他佩服他们的刻苦钻研精神，同时对他们研究的目的性也感到惊奇和怀疑。一九二三年他从日本返回祖国，先后在广州的南武、大光、培英等中学教语文和历史，重点是教历史课。这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工作的需要，个人的兴趣，使他迫切地要求增广历史知识，开拓认识历史现象的眼界。正好那时他家中有一部竹简斋《廿四史》，尽管并非善本，他也立刻如饥似渴地读起来。通过这样的边干边学，开

始了有系统地阅读中国历史典籍，为他以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北伐战争前夕，广东地区作为革命的策源地，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乐素同志目击了革命形势如何发展和高涨：孙中山先生依靠共产党人改组国民党后，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国民革命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一九二五年六月开始的省港大罢工，给了广东反革命势力及其支持者英帝国主义以何等沉重的打击；……。他从童年时代起，就经常听到人们谈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轶事，对孙中山先生产生了敬仰之情；现在又受到时代的现实教育，于是在一九二六年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任第五军政治部宣传员，一面根据总政治部的宣传纲领宣传革命，一面积极学习国民革命的理论。一九二七年四月，广州的反动派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发动“四·一五”政变，在广州展开了血腥大屠杀和大逮捕。鉴于国共合作局面已被破坏，社会秩序十分紊乱，乐素同志在苦闷彷徨中脱离了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八年初赴上海，进入蔡廷锴将军及一些广东同乡联合兴办的民众烟草公司暂做文书，同时利用余暇搜集史料，正式开始了历史研究工作。

陈乐素同志的历史研究工作是从研究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展开的。二十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野心日增无已，不仅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国的东北，要求所谓“特殊利益”，也觊觎着我国的内蒙古；除进行政治、经济的控制和渗透外，还派了一批批学者来作所谓“史地考察”。乐素同志还在留学日本时已多少觉察到，有些日本学者之着重研究中国，未必是单纯的学术研究。他曾经注意到：在日本学术著作中，有一些是对中国有着友好愿望，爱好中国文化，为探讨学术问题而研究

中国的，另一些则带有蔑视中国，以为积弱不足道的色彩。这时就更加感觉到这些“史地考察”，必有一些与日本军部的侵略意图有关。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感到不能对这种局势熟视无睹，爱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拿起笔来，为唤起同胞注意尽一份力量。“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于是着手研究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特别是甲午战争史。一九二九年，他进入新成立的《日本研究》杂志社担任主编，开始有计划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经过对《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以及我国南朝宋、齐、梁、陈各朝历史和隋、唐史上有关日本史料的仔细钻研，并对某些朝鲜古籍和日本古籍作了认真的考察，经过比较研究写出了一些论文，在《日本研究》创刊号和第二期上发表了其中的《魏志倭人传研究》和《后汉刘宋间之倭史》。这两篇文章系统地探索了后汉至南北朝时期中日之间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考证了中日古籍记载中的差异之点，提出了对日本古代史上一些未决问题的看法。例如，《后汉书》和《三国志·魏志》都有邪马台国遣使来中国朝贡的记载，《魏志》并记有该国的详细情况和女王卑弥呼的名字。同时两书又都有“倭”和“倭国”等词称。这些名称的渊源和含义如何，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日本古籍中的“大和国”关系怎样，各该国坐落何处等等，在日本曾引起过热烈的讨论。邪马台国与后汉、特别是与三国时魏国的交往，是日本古代史中的一件大事，搞清邪马台国的情况，有助于搞清日本古代史。关于邪马台国的地望，当时有着“大和说”、“熊袭说”、“肥后山门说”、“筑后山门说”等多种不同主张；关于该国女王卑弥呼，不少人认为就是日本传说中的神功皇后。而“倭”和“大和”的日语音训都是Yamato，与汉文中的“邪马台”相近似，三者是否同一国家？而《魏志》中既有邪马台国，又

有倭国，是否当时有两个同称Yamato的古国同时存在于日本列岛？这些都是那时日本古代史讨论中的重要问题。乐素同志经过对我国和日本及朝鲜三国史籍的仔细钻研考证提出：《魏志》中的邪马台国在九州北半部的中南；“倭”的名称是后汉初期以来中国对日本古代民族的称呼，它的来源虽不确知，必早于后汉，且当是据日本语音的汉译，而非如某些解释所说“倭字从人，从禾，从女，倭国皆繁盛”之类的意译，更不带歧视的含义。他认为，“倭”字之读音为Yamato，源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作者误认神功皇后为卑弥呼，把神功皇后和日本诸天皇所都的畿内，即《古事记》所说的大倭和大和，当做卑弥呼的王都邪马台；而畿内立国之祖神武天皇的名字也就被冠以“神倭”字样，称为神倭伊波礼毗古。从而Yamato一词带上了神圣的色彩，成为“日本民族之灵”。此外，又因《汉书》中“倭”字一称指日本民族，于是把“倭”与“Yamato”合而为一，读为Yamato，而大和的“和”是“倭”的谐音，遂也读为Yamato。因之，“因根本立足点有误，遂至联带之推想无不误，而后此千余年来沿此误以为史实。”实则，“定此倭之名称，距日本之有文字早数百年，而所谓邪马台，为魏时倭中女王国都名，倭与邪马台其音迥异，其文亦悬殊，其强牵合之者，显为后来之事”。即是：倭，是中国对于日本民族的总称，在后汉以前已出现；《魏志》中的邪马台女王是倭人的一支，女王国地点在九州北半部之中南，比大和之读作Yamato时间上要早；大和之读为Yamato，应是它的统治者南下扩展至邪马台国以后的事。此外他还对中国史上所记日本古史的一些中缺部分，根据朝鲜史籍作了考证，对照中、日、朝三方面史料得出自己的结论，加以系统的论述。这两篇文章内容翔实，在某些方面有创见，考

证有功力，就当时来说，为日本学术界深入探索和解决日本古代史上的疑难，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有益论证，引起日本学术界的重视。当时的日本著名历史学者中山九四郎先生认为它们是“中国青年学者的真实有益的研究”，是“比较精细的新研究”和“有益的文字”，“有必要加以介绍”，曾在《东洋史讲座》和《大日本史讲座》的《支那史籍上的日本史》专著中分别加以较详的转载。^①

乐素同志所以以相当长的篇幅论证后汉至南北朝之间日本的历史，是希望从中日友好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在涉及由学术、宗教以至日常饮食起居习惯以及中日交通、贸易等多方面的广大领域中，中国文化的传播，给了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以如何程度不等的重要影响。而这一点，虽然为一些公正的日本学者所承认（如木宫泰彦的早期著作《中日交通史》），却正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极力抹煞；指出古代中日双方很早就开始了友好的相处、往来的关系，与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之侵陵中国，形成何等鲜明的对比！他认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力图以武力攫取我国东北的野心，我国人民应该警惕，日本人民也应警惕，日本的学者们更要“谨防上当”，以免在“学术考察”的名义下为日本军部的侵略野心所利用。正当他在这个学术领域继续钻研，准备陆续完成隋唐至中日甲午战争这一千余年间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史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这一震撼了全中国和世界人民的事件，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① 《大日本史讲座·支那史籍上の日本史》昭和十一年（1936年）再版本第五、七、九章。

二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大好河山被日军占领，乐素同志对当时执政者的不抵抗主义非常愤慨；而侵略者步步进逼、平津岌岌可危的形势，更使他日夜忧心。那时他的父亲久已定居北京。国难带来家愁，促使他在研究工作中探究国家兴亡的事例和规律，以为救亡兴国的借镜。他在以往涉猎我国古籍时曾经注意到，历史上强邻压境的情况以宋代最为突出，而北宋昏君宋徽宗还有意收复前朝失地燕、云十六州，现政府却持不抵抗主义让出了东三省！尽管两者性质不同——当代外国侵略者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不能与历史上我国内部民族之间的矛盾相类比，然而从执政者的角度而言，一味屈辱忍让，卖国求存，他认为连宋徽宗都不如，于是着手研究宋朝与辽、金之间的关系，一九三三年发表了《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一文。这篇文章叙述了谋复燕、云的经过，说明谋复的必要性，探索了失败的原因，指出后晋割幽云十六州与辽，结局是自食恶果：“首先受其祸害者即割让十六州之晋，出帝被掳而亡国。”因之，宋徽宗谋复之举，是“感于历朝之受此压迫，偶闻金崛起于东北，屡败辽师，认为良机之至，遂欲因其力以收复燕云，除百年来之大患”。恢复固有疆土，“此种思想绝不能谓为谬误”，问题在于“当时之君臣实暗弱庸陋”，“事先无缜密之计划与充分之准备，临时仓卒弥缝应付，措施乖缪；发动以来，军事上外交上复频露自国之弱点，促进侵略者之野心。”概括地说就是：谋复燕云之失败“非战之罪”，错误在于作无准备之战，原因则在于朝政腐败，君臣昏弱不图自强。他还批判

了在关系到本国边境安危上企图采取中立态度的观点：“然当时之反对派不明形势，以为辽金之战，中立可以无事，……然则金既灭辽，宋能否遏止其南侵之野心？”他认为，宋辽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北宋民族冲突中的主要矛盾，宋之联金收复燕云，正是“感于此种长久之痛苦刺激，一旦欲乘机起而作反抗运动，殆亦当然之势。”所有这些，是对宋徽宗谋复燕云之战的评价，亦是“以古喻今”，对当局不抵抗主义和腐败统治的谴责、批判。他以大量史实论证自己的观点，在当时宋史研究还相当薄弱的情况下，增添了一份有生力量。由此开始，他决定以研究宋史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他的研究工作重点，也由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研究转到宋史研究方面。

在决定把外患频仍而经济文化却相当发展的宋代作为历史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时，乐素同志首先遇到的是大量的史料问题。宋代史料比之唐以前数量明显增多，单文集一项，仅据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所撰《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书目，唐人文集有七十多部，北宋文集已达一百三十多部，南宋半壁河山，文集数字增到一百四十多部。两宋文集合共约为唐人文集的三至四倍^①。要想掌握和准确运用史料，首先就必须掌握史料的目录，才谈得到进而鉴别史料真伪，选择采用。乐素同志在留学日本为陈垣同志收集宗教史资料期间，陈垣同志就嘱咐他尽可能掌握详尽的书目，逐目找书翻阅，作好摘录。这培养了他对史料本身和史料采集方法的重视。因而当他着手进行宋史研究之前，便先用了相当时间研究了我国古籍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避讳学、考据学、年代学等等，以求掌握打开浩繁的

^① 见陈乐素《略论直斋书录解题》。

宋史史料宝库的锁钥。这方面的工作他一直继续不断，随着宋史研究工作的展开，对古代藏书情况及其书目的研究，也成为他的历史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基础上，他首先着重研究了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因痛感靖康之耻而写的关于宋代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国会盟的史书《三朝北盟会编》及其作者徐梦莘的一生事迹，一九三四年发表了论文《徐梦莘考》，一九三五年发表了专著《三朝北盟会编考》，共约十五万字。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就离开了《日本研究》杂志社，靠撰文维生，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工作。一九三五年，由蔡元培先生推荐，被当时的教育部派赴日本，考察我国古籍流传日本和日本史学界研究中国的情况，得以再次仔细阅览了静嘉堂文库汉籍部目录，研读了该库所藏原属清代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一九三六年回国后，先后发表了缕述宋初官方收集图书的渊源、经过、制度和公私藏书情况的《宋初三馆考》及考证明代徐光启所写《毛诗六帖》的《记万历刊本毛诗六帖》。

《三朝北盟会编》是徐梦莘毕生心力之所倾注，积四十六年之功完成的一部记载我国古代宋、金兄弟民族之间会盟、谈判、通和、用兵情况的巨著，全书二百五十卷，所引用的书，不包括文集在内，已达一百九十六种^①。徐梦莘在“自序”中谈到他写这部书的缘起是：自靖康之难以来，“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见闻，笔而为记录者无虑数百家。然各说有同异，事有疑信，深惧日月寢久，是非混淆，臣子大节，邪正莫辨，一介忠款，湮没不传。于是取诸家所说及诏敕制谱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铭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使忠臣义

^① 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淹没也。”这部既具政治教育意义又富学识价值的史书，过去还没有人对它和它的作者作过系统的、较深入的考订和研究。乐素同志深感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与《会编》所记述的时代有某种相似之处：敌骑纵横，国土日削，统治者骄淫无道媚敌偷安，人民陷于水深火热境地，爱国志士则抗敌不屈，可歌可泣——这方面，“一·二八”上海抗日志士的业迹留给他很深的印象。在万马齐喑，爱国有罪的黑暗统治下，他决定以学术领域作为战场，从历史借鉴中提醒人民对不抵抗主义的痛恨和对爱国者的敬爱与颂赞。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对这部宋朝“国难痛史”《三朝北盟会编》及其作者徐梦莘的生平进行了研究，写出《三朝北盟会编考》和《徐梦莘考》。从政治上说，这“两考”是他自己爱国心声的表达。他在文中指出：“非战派之高宗与秦桧乃内向以全力应付一切反对势力与思想，以遂行其所主张之苟安的妥协主义”。但靖康之耻，“不特宋人所不能遗忘之痛，亦汉民族史上最大耻辱之一。又况徐氏生当此年，其所感受自更深也。北宋既亡，南宋接兴，而祸乱方炽；两河既已非国有，长江下游且相继遭敌骑之蹂躏。徐氏甫四龄即身逢其难，幸为母襁负南奔，得免于死。及长，渐知家难实随国难而来，痛愤之回忆，遂导之为事实之寻究。”这最后的几句话，实际上也正是他自己的切身痛感。从学术上说，这“两考”详征博引，考证并纠正了《会编》各种传抄本和刊本的不少错误，也考订了《会编》本身的一些有疑问之处，并对一些不足之处作了校补。例如《会编》引用的“著述”部分，大多数是节录，而原书多不传，涉及的人很多无传可循。这些著述梗概如何，难有现成完整的资料说明。乐素同志就平日涉猎所记，写成《三朝北盟会编考》中的一章：“引用书杂考”，对

徐梦莘所引用的五十一种多未传世或流传极少的著述，根据各种书目和宋人、金人以至元、明、清各代人的著作，写出考订和论述约三万五千字。这类考证，既是对《会编》本身的说明和补充，也有利于后人治学的参考。他写这“两考”的时候，有些善本书无法看到，给考订工作带来相当困难。他的有些结论看来虽似简单，所费功力却不少。例如聚珍本楼钥《攻媿集》中《徐梦莘神道碑》称：“建炎二年，寇躏江右。”乐素同志认为这个年代不确，而年代问题牵涉到有关的历史事件，因之反复求证，考订为建炎三年。一九六五年，台湾大学王德毅教授所撰《跋陈乐素〈徐梦莘考〉》一文^①引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旧钞本朱墨合校楼钥《攻媿集》，证明实际正是建炎三年。王德毅先生说：“是陈氏所反复考证求得者，乃得此佳本而证实之，岂非快事！”王德毅先生并在所著《徐梦莘年表》中谈到：这“两考”对于《会编》及其作者的研究，“都是很值得参考的”，在有关本书（按指《会编》）的内容、流传版本、引用书目和材料来源，陈乐素撰之《三朝北盟会编考》言之甚详，兹不重赘。”^②

自然，乐素同志完成这“两考”的时候，还只是三十二、三岁的青年，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索、补充。这方面，王德毅先生所撰《徐梦莘年表》一文作出了可喜的贡献。这实际上是我国大陆学者同台湾学者之间，在不能互通音问情况下进行的学术文化交流。乐素同志对此表示钦佩，欢迎与台湾学者共同切磋，互相帮助，也对至今不能直接研讨深感遗憾。《三朝北盟会编考》这部著作，迄今仍

^① 台湾版《宋史研究论集》第8辑530—531页。

^② 同上书505、519等页。

不无参考价值，前若干年曾由台湾出版界改以傅乐素之名出版了单行本。

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广州相继沦陷，乐素同志携家辗转到了香港，由许地山先生介绍，到英华中学教语文和历史。那时他除了维持自己一家七口的生活外，还须帮助一些从内地陆续避难到香港的亲友，经济负担很重，有一段时期，他所租用的一层约二十多平方米的楼房，曾经住过上下三代亲属和无处安身的朋友二十多人。抗战初期的香港虽然尚未被日军占领，也已人心动荡，米珠薪桂，社会秩序紊乱，内地去的人十分艰苦，日军占领香港后，这种艰苦情况更甚。乐素同志尽管负担很重，却非常关心这些亲朋友好。在香港被日军占领期间，有一次袁同礼先生来他家，长谈数小时，已过午饭时间，既不言回家吃饭，又不肯留下共餐。乐素同志感到袁先生的谈兴有点异常，问讯之下，原来袁先生家里粒米俱无，是出来找米的，却因知道旅港难友的艰苦，不好意思提。乐素同志立刻把自己刚托人买到的一袋十来斤大米，亲自扛送到袁先生家。又一次，陈寅恪先生也因无米下炊，找朋友帮忙来到他家，他也立即把家里储备的米装了一袋相赠。那时寅恪先生已患眼疾，视力很差，乐素同志也同样亲自扛送。寅恪先生经常念道这件患难交情，曾在乐素同志临离香港前把自己在英国讲学时穿的一套西装赠给他，留作纪念。

尽管当时生活是这样，乐素同志并没有把香港当作单纯的“避风港”。他继续历史研究工作，争取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